

马克思人口生产理论的系统考察^{*}

杨成林^{**}

【摘要】马克思关于人口生产问题的重要论述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研究发现,经由早期《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的初步分析,到《资本论》手稿中对古典和庸俗经济学人口理论的批判,再到《资本论》中的研究与阐发,存在一个揭示人口增长规律的嵌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的人口生产理论。马克思人口生产理论可总结为:一个核心规律、三对重要关系和三个重要问题。尝试探索和建构马克思人口生产理论,既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需要,又是解释和回应现实问题的需要。

【关键词】人口生产;人口增长规律;生产方式的变化

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有生命的个人要维持和再生产自身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同时,正是在这个不断满足人的需要和创造新需要的过程中,人们通过劳动不但维持着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还生育生产他人的生命,即人口的生产。

作为唯物史观的进一步证明和运用,人口问题同样适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人口被视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p.37),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遗憾的是,正如马克思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完成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鸿篇计划,他亦没有留下专门阐述“人口”问题的专著。但即便如此,从马克思1851年在英国博物馆中阅读材料的主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3部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结尾中关于分篇计划的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p.46),到《资本论》及其各阶段手稿中的大量论述,

^{*} 作者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农业经济理论研究”(25BKS017)的资助。

^{**} 杨成林,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E-mail:yangchenglin@hust.edu.cn。

引文格式:杨成林.2025.马克思人口生产理论的系统考察[J].政治经济学季刊,4(3):134-150.

Cite this article: YANG C L. 2025.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population production [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4(3): 134-150. (in Chinese)

仍说明马克思十分重视这一主题,并给予其大量的经典分析。关键在于,要基于分散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尝试探索和建构一个内嵌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揭示人口增长规律的人口生产理论。

一、唯物史观中人口生产问题的初步探索

人口问题很早就已得到马克思的重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逻辑起点和分析理路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清晰而简明地确立了人口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首先“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a,p. 146)。无疑,人的生命或肉体组织的维持和再生产需要依靠自然界。后者是前者存在的前提,这是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这个事实清晰地指明了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是,仅仅有此关系还不够,因为人的生存——必须能够活着,就需要消费衣、食、住、用、行等物质生活资料,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要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a,p. 158)。而满足第一个需要的物质生产及其所使用的工具同时会引起新的需要,新需要的满足及其过程又会引起更新的需要。如此不断扩张的再生产展示了第一个历史活动被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动态历史图景。

在这个再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夫妻、父母与子女间的家庭关系,即被马克思称为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的“第三种关系”。重要的是,人们不仅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还开始生产新的生命——繁育后代。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人和人口繁殖已不再单纯决定于人的自然本能,或是不再像没有受人干涉的动植物那样,完全受制于自然。换言之,人口生产在保留自然本能或自然规律约束的同时,越来越受社会关系的影响。社会关系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b,p. 2)。这种关系和人自身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它决定于人的需要和一定的生产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其现实性上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必然包含着人自身的再生产和新生命的繁育。总之,“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a,p. 160)。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按照概念范畴抽象层次的进一步设定,已经越来越将人口生产的决定因素指向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本范畴。尽管这时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表述,尚不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样清晰经典,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想要表达的那种含义,即人口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而且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辩证统一的双重关系。这是因为,自然属性或自然本能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反,强调人口生产的社会属性,也需基于人口生产的自然本能,因而不能否认或忽视自然本能的存在及作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所展示的人口生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见图1。如果说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的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列宁,2009,p.17),那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人口生产问题的批判与阐释,就是对他和恩格斯人口生产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证明和运用。从整体上看,马克思对人口生产问题的分析基于两条批判性思想线索。第一条线索是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特别是对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及其观点的批判。第二条线索与第一条线索密切相关,原因在于马克思通常将这些批判置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即人口生产问题内嵌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之中。因此,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是揭示人口的增长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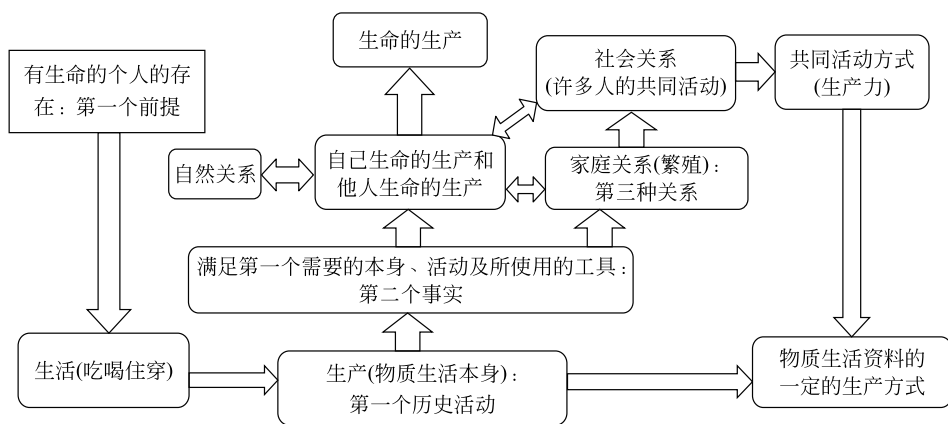


图1 人口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二、马克思对古典和庸俗经济学人口理论的批判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人口分析可追溯到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的真正鼻祖“重农学派”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p.15)。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也都将人口问题置于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研究之中。对应于

生产的资本主义研究,除马尔萨斯外,其他人并没有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著述。

(一) 马克思对古典和庸俗经济学人口理论批判的第一层次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包含对其其中的人口理论及其基本观点的批判。在这条线索中,由于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在理解资本,理解阶级、货币、价值和交换价值等,特别是在理解资本及其在生产活动中如何创造剩余价值——“政治经济学上的最重要的问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及它们之间关系方面存在着模糊不清、困难或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b, p. 25)。概言之,正是古典和庸俗经济学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运动规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他们在人口问题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观点,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错误。

阐明这个问题非常必要,因为这关系到马克思人口生产批判的不同层次。马克思的有些批判并不是直接的或有针对性的,而是在批判其他模糊不清、错误分析和错误观点时对人口问题的引用和评注。很显然,模糊不清或错误分析根本无法得出正确的人口分析结论,因而对前者的批判就间接是对后者的批判。在马克思的论著,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人口生产问题的论述多是此种情况。这些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对古典和庸俗经济学人口生产理论批判的第一个层次。在此,无须赘述。

(二) 马克思对古典和庸俗经济学人口理论批判的第二层次

不同于第一个层次,马克思在批判,厘清模糊不清、错误分析和错误观点的同时,给予人口问题以更直接或更有针对性的批判。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关于资本价值的增加。[李嘉图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和模糊认识]》这一部分中,马克思对人口增长问题的强调是此类批判的典型例证。由于李嘉图在财富本质问题上的模糊不清和错误认识,特别是在这一点没有得到正确说明的情况下和地租理论纠缠在一起,使他根本无法理解财富的起源。虽然李嘉图意识到增加价值本身的途径,除了生产越来越困难外,只有资本增加才能引起工人人数的增长——人口的增长,但是“他自己对这种关系从未作过简要的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 p. 289)。马克思认为,李嘉图陷入了极端荒谬的矛盾之中。所以,如果按照李嘉图的方式思考问题,那么“不加进较多的实际工作日,——他就无法理解交换价值怎么会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增加。另一方面,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人口的增长作为增加交换价值的一个要素加以研究;他甚至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地谈过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

p. 317)。显而易见,财富、价值或交换价值、人口增长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里以马克思质疑和批判的方式出场。

从逻辑关系上看,这里的潜台词是“李嘉图关于资本增殖的错误和模糊认识,导致其无法正确地阐明人口增长之于交换价值增加的作用”,而且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李嘉图“甚至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地谈过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马克思又谈到李嘉图意识到了问题,因为资本家关心的就是价值,并且历史地看,抽象财富即价值总额不断地增长。那么,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李嘉图给出的解释是:“资本的积累比人口的增长快;因而工资增加;接着人口增加;接着谷物价格上涨;接着生产的困难程度增加;因而交换价值也就增加了。这样,李嘉图通过迂回的道路终于达到了交换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 p. 320)通过这种方式,李嘉图进一步地将工资决定规律、人口增长规律、地租理论与交换价值的增加(资本的增殖)结合并纠缠在一起。然而,正是这种纠缠,使李嘉图无法在生产力不断增长的事实基础上,正确地说明交换价值的这一增长。基于生产力不断增长的前提,其正确的展开逻辑应该是:资本积累→工资上升→人口增加→工资下降(有时低于其价值)→积累的资本的余额。这个余额通过雇佣活劳动而实现增长,所以资本的交换价值增加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李嘉图的理论中甚至对人口的增长也理解得不正确”(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 p. 321)。更进一步地,马克思指出了李嘉图无法做出正确说明,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关键,即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明:物化在资本中的全部劳动时间与活的工作日,特别是必要劳动时间与活的工作日和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可变关系。

事实上,即使工资不提高,人口也会增长,因为工资不仅要维持工人本身,而且还要维持工人的再生产。关键在于,“为什么人口增长得不够快?而且必须要有某种特殊的刺激?仅仅是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单纯取得更多的、李嘉图所理解的那种‘财富’,而是要支配更多的价值,更多的物化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 pp. 321-322)。为了达到资本的目的或提供人口增长的某种刺激,只有工资下降。李嘉图给出了这个答案,而为了这个答案,“李嘉图假定人口增长。为了在这里证明人口的增长,他假定对工作日的需求增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 p. 322)。要注意,对工作日需求的增长要以资本的价值增加为前提。只有这样,资本才能购买更多的物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以换回更多的活的工作日。在这里,马克思批评道:“李嘉图最初恰恰是从相反的前提出发的,而他所以会走弯路,只因为他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1979a, p. 322)可见,李嘉图做出的是循环的、有矛盾的论证。马尔萨斯发现了这一点,但当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时,也陷入了困境。

相比第一种情况,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种更为直接和更有针对性的评注和批判,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中并不多见,这一批判对马克思的人口生产分析十分重要。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评注、批判和澄清说明,并非来自人口问题本身,而是来自人口增长规律背后的那些决定性因素。回到人口增长的根源上,马克思在同一部经济学手稿中关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中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问题。资产阶级财富作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媒介]的部分,给予了明确地回答。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理解[剩余]价值的产生是困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p. 288)但是,要理解剩余价值必须先理解价值,而要理解价值就必须理解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只有厘清这些根本问题,才能破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与实质。可是,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犯了糊涂,甚至是错误。李嘉图反对斯密把价值由工资决定和由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混为一谈,马尔萨斯则责难李嘉图不懂得剩余价值,但他们都陷入了困惑。

李嘉图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从来没有研究价值由工资决定和由物化劳动决定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从何而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p. 289)。在第二个层次的批判中,马克思只是确认并提出李嘉图人口理论的主要问题及成因,除了进一步廓清和论证在生产力提高基础上能够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外,马克思并没有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以阐明和解决问题。但是,马克思留下了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即只要能够厘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探寻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就能阐明李嘉图所未曾正确说明的人口增长的观点。

(三) 马克思对古典和庸俗经济学人口理论批判的第三层次

如果说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属于评述与廓清,那么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他对马尔萨斯的批判则更为严厉,更具针对性。从语气上看,马克思称李嘉图为“古典学派大师”,而称马尔萨斯为“无耻剽窃的剽窃能手”。在马克思看来,“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第一版,除了纯粹夸夸其谈的部分以外,除了抄袭华莱士和唐森两位牧师的著作以外,几乎全部抄袭斯图亚特的著作”(马克思,2004a,p. 408)。马克思在措辞和语气上的不同恰恰显示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所存在的不同问题及马克思人口理论批判的不同层次。

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包含着赤贫。[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理论的虚假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过剩人口和过剩资本]”这一部分。在这一经典批判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p. 104)任何个人要想维持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

就必须同生产的再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人和生产的再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不同方式就是生产方式。如果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由于某种原因,被置于特定的再生产条件之外,那么他或他们就变成了过剩人口。过剩人口存在的事实说明,在任何既定的生产方式下,“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说由一定形式的生产条件的扩张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随生产条件而变化,收缩或扩大,……,那么,人口的绝对增长率,从而过剩人口率和人口率也会随生产条件而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p. 105)。

这一点对于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同一生产方式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是成立的。因此,“在一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过剩人口,也和当时的正常人口一样,都是被决定的。过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便是一定的生产基础可能产生的人口”(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p. 105)。正是由于生产条件扩张的不同机制及能力所设置的人口限制,决定了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着不同的人口增长方式。具体而言,在所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生产条件的所有制关系“表现为生产力的预先存在的限制,而且这种关系只应被再生产出来,所以,总括了一切生产力发展的人口的增加,尤其要遇到外部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p. 105)。相比而言,在资本主义时代,过剩人口表现为资本——生产条件所有制关系的自身运动,是这一运动带来的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基于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马克思清晰而深入地对人口增长规律做了唯物史观的经典阐释。马尔萨斯从生物学和自然属性的角度定义了两个公理,假定了两个级数,并据此作为其展开论证的根本前提。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的增殖力远比生活资料增殖力巨大,因而两个力是不平衡的。那么,如何使两个自然力的结果保持平衡呢?马尔萨斯的整个论证都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其答案是外部限制,即积极抑制和预防抑制,其中,包含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社会制度都是答案的注释,财产私有的社会制度产生于人口的自然法则,因而不可避免。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两个公理和两个级数可视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硬核”。如果这个理论的硬核是错误的,那么该理论本身也必然如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最大问题,恰恰就是马克思所强烈地批判的这一“硬核”。尽管马尔萨斯强调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有过剩人口这一事实是正确的,但他“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这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p. 106)。特殊的、具体的历史所具有的差异性、复杂性,完全被他抽掉了。对此,马克思评价说:“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马克思,2004a,p. 728)恰恰相反,在历史上,“人口是按照极不相同的比例增加的,过剩人口同

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由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规定的界限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p.106)。雅典的奴隶、靠修道院过活的乞丐、封建主的侍从、习艺所里的工人都是历史地决定的人口规律的重要例证。

进一步地说,马尔萨斯的错误在于,一方面,存在于他头脑中的自然人繁殖的人口规律,并不是现实的历史过程的抽象和反映,而是恰恰相反,现实的人口是他的抽象规律的应用。据此,马克思强烈地批判道,“在历史的每个阶段上成为人口和过剩人口的条件,成为内在条件的那种东西,到了马尔萨斯手里却成了妨碍人口按照马尔萨斯的方式发展的一系列外部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p.107),即不同经济社会时代的生产和再生产条件,成为马尔萨斯自然人繁殖的外部限制。另一方面,历史地受人的活动限制和决定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会给自身设置障碍或外部限制。相反,在纯粹自然界中进行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长,若没有外部限制,就不会自动停止。概言之,“马尔萨斯把人类繁殖过程的内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界中进行的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内在界限或繁殖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p.107)。

综上,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不仅呼应了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人口分析,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了过剩人口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及两者之和的绝对增长率等具体观点及决定因素。不难发现,结合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及其所留下的那条逻辑线索,马克思人口生产理论的唯物史观框架具备了,分析阐释的逻辑线索清晰了,具体的理论观点也明确地指出了。剩下的任务就是抛开解释人口规律的永恒自然规律,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历史的自然规律去解释它,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建构它,使它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而不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p.38)。

三、人口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建构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里的生产是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作为社会关系总和,个人是生产的出发点。对于任何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而言,要使其按照原有的样子继续运行下去,人口的维持和再生产就必须在原有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相反,要想实现原有生产方式的变革,就必须使人口的再生产逐渐破坏和扬弃原有的客观条件。一句话概括这里的含义:“生产本身,人口的增长(这也属于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p.484)

(一) 作为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相对过剩人口生产

个人要获得生活资料或同他的再生产资料发生关系,需要社会媒介。而这种媒介“与生产条件和个人同这些条件的关系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 p. 108)。事实上,这种社会媒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的、特殊的资本关系。因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马克思,2004b, p. 922)。作为物,资本本身就是生产条件,而作为生产关系,资本不仅意味着它归谁所有、如何使用和为什么目的存在,而且还决定着它自身作为生产条件的扩张能力,即人口增长所设定的限制。一言以蔽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就是生产的再生产的条件,它是社会机制运动的主动轮。“而这种生产条件同样也包括人的再生产条件,包括整个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包括相对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 p. 108),因而决定其特殊的人口增长规律。如果工人不被资本所雇佣,那他就沦为赤贫或过剩人口。这就像商品能够卖出,是商品的惊险跳跃一样,“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马克思,2004a, p. 127),是工人自身。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马克思,2004a, p. 384)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过程的技术和社会条件的变革,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愈发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工作日是固定的,那么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就意味着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这就是马克思在指摘李嘉图时所说的,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明“必要劳动时间与活的工作日和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可变关系”,从而不能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的人口增长。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增长规律,表现为内生于资本运动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的本性要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或减少一定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必要劳动的数量,所以一部分必要人口就变为过剩人口,或者说,除了必要人口之外,资本还要产生过剩人口。如马克思所言:“减少相对必要劳动表现为增加相对过剩劳动能力——也就是造成过剩人口。”(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 p. 110)然而,资本的本性不仅产生,而且需要过剩人口,即“资本既有把人的劳动变成过剩的趋势,又有超过一切限度来推动人的劳动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b, p. 551)。问题在于,资本按照两个相反的方向在过剩人口的生产和使用上发挥作用。哪一种趋势占上风?答案见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机制和发展趋势,特别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剩余价值量、人口和资本积累之间的相关关系,那便是“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人口以及取决于其他一些情况(资本量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b,p. 211)。尽管马克思指出特定条件下的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的相互因果关系,但是他特别强调人口的增长是再生产或资本积累的结果。换言之,人口增长规律表现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作为“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转化为资本的无酬劳动和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马克思,2004a,p. 716)。不同于资本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绝对运动的“经济学教条”,马克思明确指出:“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马克思,2004a,p. 715)

回到《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不仅指出正确理解人口增长规律需要揭示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可变关系,而且更是明确地指出由资本本性所决定的剩余劳动与过剩劳动、必要人口与过剩人口这两对重要变量之间的可变关系。马克思甚至试图用数字例证,说明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马克思论证道:“即使用来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同整个资本相比减少了,所使用的活劳动的总量仍可能增加或者保持不变,只要资本按相同的比例或更大的比例增长。因此,随着必要劳动的减少,人口可能不断增加。”(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p. 285)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引入了资本增长。尽管他没有言明这就是“资本积累”,但话锋一转,马克思又明确地告知:“不过,这种情况要在考察积累理论和人口理论时才能更详细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p. 285)毫无疑问,若没有手稿中一步步地递进展开与铺垫——人口生产批判与分析的一条清晰的逻辑理路,就不可能有《资本论》在考察“积累理论和人口理论”时的经典论述了。

表现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人口规律”,正是资本积累的运行机制在人口变化规律上所体现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必然导致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的相对增长和资本价值组成的不变部分比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增长,反映在人口或劳动力需求上就是追加资本会相对地雇佣越来越少的工人,同时按照新的构成周期地再生产出来的原有资本也会越发排斥它以前雇佣的工人,即资本积累不断地生产出相对的超过资本增殖需要的“过剩的工人人口”。结果是马克思著名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这一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相对过剩人口产生于资本,绝对地从属于资本,是资本可以随时雇佣的一支产业后备军。就此而言,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杠杆,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一个存在条件。这个存在条件贯穿于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即工业的周期波动,一方面,过剩人口的周期性变动是工业周期性波动的基础;另一方面,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是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换言之,“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马克思,2004a,p.738)。在马克思看来,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工人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的范畴。“经验向资本家表明,过剩人口,即同当前资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较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马克思,2004a,p.310)相对过剩人口总体上可划归为三种形式,即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

(二) 马克思人口生产理论中的三对重要关系

相对过剩人口规律是马克思人口生产理论的核心。除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外,马克思的人口生产理论还包括三对重要关系。第一对是人口生产的自然本能与社会制度决定性作用之间的相关关系。这对关系的两个方面分别对应马尔萨斯和马克思在人口生产问题上的不同着眼点。尽管马克思激烈地批判马尔萨斯的抽象人口规律,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两性之间的情欲或人口生产的自然本能在人口繁殖中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曾言:“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衍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马克思,2004a,p.660)显然,这段话中的第一句对应人口生产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历史制度的决定性作用。第二句则明确指出工人繁殖后代必须依赖自然本能。特别地,这段话也表明了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相关关系,即人口的生产是社会制度因素和人口繁殖自然本能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不过,两性之间的情欲虽是人的自然本能,但这一情欲越发地打上了社会历史制度的烙印。例如,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工人家庭的“最低生存工资”,对工人身心的过度耗损与破坏等诸多因素,都将影响工人的繁殖能力和繁殖意愿。人类繁殖的自然本能被抑制的事实,反映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塑造不同的劳动力维持和再生产以及繁衍后代的方式。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要系统地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使之保持适度张力以适应生产方式的发展。

相对过剩人口生产和绝对人口增长的关系是第二对需要说明的关系。不同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不同的相对过剩人口增长规律,而且还决定绝对人口增长规律。因为不同生产方式下的社会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所以随着生产条件的扩张或收缩这一人口生产的外在限制的变化,从过剩人口率和人口率,到人口的绝对增长率,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这里,做两点说明:其一,马克思

点明了过剩人口增长率和人口的绝对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们都随着生产的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马克思并没有展开两者之间相关关系的详细研究。其二,“人口的绝对增长率=过剩人口增长率+人口率”或“可能产生的人口=过剩人口+人口”。这两个等式说明,在人口的绝对增长和相对过剩人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调节两者之间的可变关系。联系《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批判马尔萨斯时的上下文,特别是《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使用的“人口率”和“人口”,指的就是基于人类繁殖自然本能或两性间情欲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不难发现,第二对关系是对第一对关系的进一步具体化。“人口的绝对增长率=过剩人口增长率(决定于社会历史制度或生产方式)+人口率(决定于两性间的情欲或人口繁殖的自然本能)”。第二对关系进一步佐证,马克思并不仅仅是人口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者。基于自然本能的“人口增长率”在他的研究中从来没有缺席过。只是马克思在批判抽象的人口理论时,格外强调决定于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人口规律以及这一规律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意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马克思,2004a,p.731)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既强调了资本扩大工人人口的趋势——首先要由人口的自然增长加以满足,又强调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无法满足资本的需求,因而必须由相对过剩人口来补足。换言之,“资本主义积累并不是单纯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增长”(马克思和恩格斯,1985,p.74),“积累除自然的人口增长以外,还经常储备有和制造出供它支配的过剩人口,这是更多地积累资本的活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1985,p.97)。相对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它的特殊意义在于“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马克思,2004a,p.736)。

虽然“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p.115),但与之不同的是,调节人的生产或劳动力的供给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生产和人口自然增长的相互作用的双重机制。当然,马克思为什么说人口的自然增长无法满足资本积累对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需求?答案还是要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决定绝对人口生产规律、相对过剩人口生产规律、人口自然生产规律,特别是人口生产的制度决定和人口繁殖的自然本能以及相对过剩人口生产和人口自然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中去寻找。

劳动人口增长和一般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第三对需要说明的关系。马克思曾言:“一切剩余劳动形式都需要人口的增长:第一种形式[绝对剩余劳动形式]需要劳动人口的增长,第二种形式[相对剩余劳动形式]需要一般人口的增长,因为这种形式要求发展科学等等。人口在这里是财富的基本源泉。”(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p. 293)在此,马克思首先确认了一个基本事实:劳动,从而人口是财富或一切剩余劳动形式的基本源泉。基于这个事实,马克思依据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不同形式,进一步区分了劳动人口增长和一般人口增长。然而,劳动人口增长和一般人口增长不能仅限于这个简单的区分。重要的是,如何探究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很显然,一般人口增长是劳动人口增长的前提。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看,同时并存的劳动力及其增长的比例,决定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多寡。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口的自然增长无法满足资本积累对劳动力增长的需求,因而需要相对过剩人口的特有生产和调节机制加以补充。而这表现为资本的自身运动及其内生出的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科学的力量、巨大的自然力和劳动结合的社会力,都为资本合并并成为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有弹性的能力。除了上述三种生产力形式外,“人口的增长,也是这种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b,p. 553)。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切随社会历史发展起来的社会力量,都要基于人口增长这个大前提。“一句话,是一切生产因素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力以及机器的应用,同人口成比例”(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p. 269),即人口的增长总括了一切生产力的发展。首先,人口的增长使分工、协作、劳动结合的社会方式的不断演化成为可能。其次,随着一般的人口增长,出现了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一部分人口独立出来专职从事科学技术的生产。“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b,p. 572)再次,在引述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中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需要是发明之母,而且只有人口的不断增长才能说明这种需要之所以永久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b,p. 185)

与第二对关系相比,劳动人口增长和一般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劳动人口的增长包含着向作为其自身调节机制的相对过剩人口生产的转换趋势,而实现这一趋势需要一般人口增长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三) 马克思人口生产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的人口生产理论中还可以提炼出三个具有较强政策含义的重要问

题。生产方式演化过程中对原有生产方式下人口增长规律的创造性破坏,是第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随着资本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p. 45)不断地消灭小生产、家庭劳动的领域以及旧社会的堡垒——“农民”,“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以及整个社会机构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也一同被消灭了。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本身完全由流通决定,转变为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这样一来,不仅生产方式改变了,而且一切与之相适应的旧的人口关系和生产关系,一切旧的经济关系都解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p. 211)。就这样,资本逐渐地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重构与之相适应的人口增长规律。这种新旧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的人口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所有处在转型过程中,特别是那些致力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一问题。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人口的繁殖是否与获得的生活资料成比例。无疑,任何物种的繁殖必然一般性地受制于生活资料的数量,并与其保持一定的比例。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不仅似乎是正确的,而且适用于任何生产方式。但是,问题远非这么简单和抽象。虽然生产条件的扩张或收缩意味着人口繁殖的限制以及繁殖数量的变化,但是人口繁殖的数量“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料绝对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同这些生存资料的生产条件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p. 108)。

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决定不同阶级和人群分得的生活资料的多寡,从而决定他们人口繁殖的比例。具体而言,分得生活资料最多,但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级,可以繁殖与之获得的生活资料相匹配的人口数;相反,占人口多数,但仅分得少数生活资料的多数人口,甚至被排斥在再生产过程之外,靠要饭、接济或救济而生活的赤贫人口,则只能繁殖与之获得的少量生活资料相匹配的人口数。

常识告诉我们,人口繁殖的数量与获得的生活资料量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正向相关关系,但也只能说是“一定的”相关关系。因为人类的繁殖本能和可观察的经验事实都无法支持上述观点。更有甚者,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反向的相关关系。如马克思所言:“贫穷人的再生产比劳动者在其自然条件下要快,因为他的再生产条件是无限小的。赤贫的人们生殖得很快,完全象在动物界一样:种类越小,它再生产的量就越大。”(马克思和恩格斯,1985,p. 490)马克思之所以语气坚定地将他的这一观点称为“人口理论中唯一正确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1985,p. 490),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事实。很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贫穷和赤贫人口的生产主要是两性之间情欲的自然本能在起作用,与之相反,这时社会历史制度给予人口繁殖的抑制作用很小,甚至根本不存在。只要能获得一点生存资料,这个群体就能活着,从而基于自然本能进行人

口的生产。作为例证,马克思引用了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中的一句话:“工厂中从事过度劳动的儿童死得惊人地快;但死者的空位,马上又有人补充上,人物频频更换,但总的情景并不因而发生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1985,p. 554)

第二个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基于获得生活资料的多寡考察一个社会的人口生产,那么只有处在两端的人群才具有较强的人口生产意愿或生产能力。处在顶端的少数人群,利用其在再生产中的优势地位,能够摆脱限制并繁殖与其获得的生活资料相匹配的人口数量;处于底端的,被排除在再生产过程之外的赤贫者阶层,单凭自然本能进行人口的生产,种类虽小,但繁殖量却大;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口占比量最大,这个群体的人口繁殖本能极大地受制于社会历史制度,具体表现为他们在再生产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而只能繁殖与其获得的相对有限的生活资料相适配的较少数量人口。总之,处在两端占比数量小的群体能生产较多数量的人口,相反,处在中间占比数量大的群体却只能生产较少数量的人口。

劳动力和人口质量的不断提高是第三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作为独特的商品,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2004a,p. 198)。虽然在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内,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相对稳定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对普通劳动力来说也是微乎其微的,但不可否认,劳动力的价值及其组成结构始终处在动态的变化中。例如,“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马克思,2004a,p. 200)。正因为“劳动力性质”随着生产力发展的同一程度和方向,向愈发复杂的程度演化,所以劳动力的培训和教育愈发重要,与之相对应的培训和教育费用也会增大。这是符合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经验事实的。因此,劳动力质量和人口质量的不断提高是劳动力维持和再生产动态变化中的应有之义,包括简单劳动下限和复杂劳动上限的提高。

四、结论和启示

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作为历史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决定或内生其自身的人口增长规律。与商品生产有所不同,人口生产有其特殊的规律与特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阐释了人口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马克思虽没有关于人口生产问题的专门著述,但从分散在系列文本,尤其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大量论述来看,存在一个揭示人口增长规律的人口生产理论。马克思的人口生产

理论建立在他对古典和庸俗经济学人口理论及其观点三个层次批判的基础之上,嵌入到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之中,由此建立的马克思人口生产理论可总结为:一个核心规律、三对重要关系和三个重要问题。

人口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从生产方式入手,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研究经济的运动机制和发展趋势,才能正确理解人口的增长规律。基于文本的挖掘与研究,本文试图对马克思的人口生产理论做尝试性建构。这一尝试没有,也不可能囊括马克思的所有观点。鉴于此,未来仍需对马克思人口生产理论做进一步的研究与系统建构。

参考文献

- 列宁. 2009.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2004a. 资本论(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2004b. 资本论(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79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79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12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12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Population Production

YANG Chenglin

(School of Marxism,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China)

Abstract: Marx's significant discussions on problem of population production are scattered in a series of his works, especially in *C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s.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rough the preliminary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German Ideology*, the critique of classical and vulgar economics' population theories in the *Capital* manuscripts, and further research and elaboration in *Capital* itself, there exists a theory of population production embedded in Marx's critic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x's theory of population produc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one core law, three pairs of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and three key issues. Trying to explore and construct Marx's theory of population production is not only the need of innovat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but also the need of explaining and responding to practical problems.

Keywords: population production; laws of population growth; changes in modes of production